

北大荒青年作家丛书



纯洁、活泼、美丽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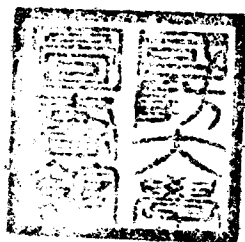
陆星儿





纯洁、活泼、美丽的……

陆星儿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6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莫 安
装帧设计：宣 森

纯洁，活泼，美丽的……
Chúnjié, nuóbō, měilide
陆 星 儿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 10

字数 200,000

1986 年10月第1版

1986 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64 定价：2.05 元



作者近照

作者小传

现年36岁，女。在上海度过童年。1968年高中毕业以后，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在“北大荒”生活十年，当过拖拉机手和新闻干事。1978年考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，毕业后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编剧。近年来发表了大量中、短篇小说，曾与陈可雄合出过中篇小说集《美的结构》（重庆出版社，1983）。

目 次

纯洁，活泼，美丽的·····	1
打湿了翅膀的小鸽子·····	104
她从天上来·····	173
碑·····	242
但愿不是梦·····	258
斑点·····	275
我爱你，野百合·····	294
后记·····	314

纯洁，活泼，美丽的……

纯洁，活泼和美丽的，它今天
是否将扑动陶醉的翅膀去撕破
这一片铅色的坚硬霜冻的湖波
阻碍展翅高飞的透明的冰川！……

——斯·马拉梅

法律顾问处。

一间普通的办公室。五六张油漆光亮的办公桌，象教室里的课桌椅，等距离排开。几只浅褐色的装着形形色色案卷的柜子，贴住了整整一面墙。门口，有一条供人等候时小憩的长椅。新粉刷的墙上，钉了一根细长的木条，挂着几本翻旧的杂志：《民主与法制》、《法学》、《社会》……

不到八点。

叶昶烈拉开椅子，伏在桌上，捧起一部厚厚的书，迫不及待地地从后面往前翻了几页。

……葛利高里离开大道，踏着罩了一层薄霜的、咯吱咯

吱响的草地走起来。他……

“你们早啊！”处长进门时，这习惯性的一声招呼，比上班的铃声还管用。

大家各就各位。

叶昶烈欠了欠身，眼光却没有离开那些具有魔力的铅字。

……阿克西尼娅在小教堂后面停下来。葛利高里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……

“完了吗？”

叶昶烈又听到了常常从他背后传来的这细柔、清晰的声音。

闵小羽是这个法律顾问处唯一的一位女律师，而且，最年轻。

他没有回答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嵌在书页最后的一幅插图，一个宁静又不平静的小院。

一阵熟悉得叫人心疼的台阶的咯吱声——

“太棒了！”他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。

“什么事？”两个中年律师，异口同声地问，又象救火似的扑过来。

“《静静的顿河》。你们谈过吗？”闵小羽也凑了过来，有意无意地紧靠着叶昶烈，那颇为得意又带点炫耀的眼神，分明在告诉别人：书是我的……

“啊，那个阿克西尼娅……”其中一个前庭光秃的律师，半含嘲意，半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，那省略的语气里，又透着一种轻蔑。

“我倒要问问你，假如葛利高里提出起诉，打算和娜塔莎离婚，然后，名正言顺地去爱阿克西尼娅，你替谁辩护？”叶昶烈把手摊在那位律师面前。

“娜塔莎。”那位律师理直气壮。

“因为阿克西尼娅是第三者？”叶昶烈又挑起了论战。他很

善于打破那种貌似安静的沉闷，把气氛搅活。插队时，他就被称为“好战分子”。他很喜欢这顶“帽子”。中学里，外宾来参观，问同学们喜欢什么！“喜欢摄影”，“喜欢打球”，“喜欢画画”，各说各的。只有他说了一长串：“喜欢漩涡，喜欢激流，喜欢狂风暴雨，喜欢气势磅礴的交响乐……”老师批评他“好表现自己”。他想不通。人为什么不应该充分地表现自己呢？自己就是自己。

“可以这么说，象阿克西尼娅这种女人……”

“这种女人难得。”

“嘘！来人了。”处长严肃地摆了摆手。

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。

门口，有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探了探头。

“进来吧！”处长把第一个迈进门的诉讼人，领到叶昶烈的办公桌前，“你接待。”是“奖励”还是“惩罚”？

他马上收起了《静静的顿河》。

这里，却是一条永远难以平静的河。

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，颤颤巍巍地扶着桌子，一抹脸，先呜呜地哭了。“告我……儿子……”

“坐下谈。”叶昶烈把椅子拉近办公桌，铺开写状子的纸，又点起一支烟。烟越抽越厉害，一天一包半。他无法节制，无法在听着抱冤叫屈的申诉、痛不欲生的啜泣、愤愤不平的叫嚷，甚至是歇斯底里的谩骂时，无动于衷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易激动，只有烟还能帮助他冷静地思考、客观地分析、公正地判断。处长告诫过他，“天天动真情，那怎么受得了？要象医生……”但毕竟不同。一个律师，他所面对的是人类社会的是非，这是一项需要激情的事业。

老太太还在伤心地呜咽。

他没有劝。眼泪会冲淡哀伤、愤懑，恢复理智。

“有人找你。”闵小羽走近他，小声地说，“在传达室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谁知道。一个女的。”

女的？为什么不进来？叶昶烈没有马上站起来。为了在闵小羽面前表现他对专程来访的“女的”不感兴趣？还不到需要有这种“表现”的程度吧。

老太太总算哭停了。

“您等一等，先喝点水。”叶昶烈这才起身。

传达室很小。靠墙，摆着一张光溜溜的木板床，窗下有一张写字台，摊着电话、报纸、杂志。几个来修下水道的青工，挤在门口，挨着个地用电话，叶昶烈只好从小窗口朝里望一眼。果然是个女的。坐在木板床上，低头看书。他看不清她的脸。她穿着白色的真丝短袖衬衣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。透明的长统丝袜，使两条交差在一起的腿，显得细洁、修长。脚上是一双驼色的凉皮鞋。我不认识她。他敢肯定。

“你找我？”叶昶烈挤进了窄小的传达室。

“你就是叶……”她很有礼貌地站起来，摊开的书，放在床上。

叶昶烈的眼光跟了过去。是本外文书，但不是英语。

“我给你写过信。”她说。

“给我？……”没有。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记忆。他不得不又打量了她：脸色有些憔悴，象秋天里快要干枯的树叶。仔细看，才见眼角有细细的皱纹，但只要脸上稍有表情，那些细密的皱纹马上就明显地刻了出来。可那两只眼睛，却异常的亮，还透着一种纯净的光，这使他难以断定她的年龄。

“大概有两个月了。”她说得具体了一些，“我叫莫湘。”

莫湘？……他的脑子飞转着，突然甩出两个字：“疯子！”他竭力不让自己的眼神有异样的变化。他想起来了，的确收到过一封奇怪的信，很短：

……我在旅行社当翻译。有人说我疯了。但我没疯。我很痛苦，希望得到你的帮助。

字不漂亮，可以说蹩脚。他把信交给了处长。“你看看。”

“喝醉酒的人，不都爱说自己没醉？一个道理。”处长随手把信扔进了字纸篓。

疯子！他眼光里的她，顿时变了。他看了看仍摊在木板床上，的那本外文书，觉得有点好笑了。正常的人，跑来法律顾问处打官司，哪还有心思读外语？他甚至怀疑，她是否真的看得懂这些密密麻麻的字母。

“我现在很忙。”他不愿意和一个失掉了理智的人纠缠。

“我可以等着。我有的是时间。”她自嘲地一笑。

这带着苦味的笑，完全出于对自己的一种十分清晰的认识。他的心顿了一下，又看了看她亮得发光的眼睛。她疯吗？他一向信任自己的判断力，可这一次？……

“那好吧，请你稍等。”叶昶烈立刻跑出了传达室，好象她会追来一把揪住他。但走出几步，他又回头，朝小窗眺了一眼。

她仍然坐在那张光溜溜的木板床上，仍然低头读那本外文书，书摊在膝盖上，那姿势，很象个用功的中学生。

他的脚步放慢了，还有点踌躇。

二

一头往昔的天鹅不由追忆当年华贵的气派……

书页上的字母，突然跳荡起来，象河沟里那一条条淘气又灵活的小蝌蚪。

“他会相信我吗？”莫湘的思绪也在跳荡。等吧，等下去。她已经等了很久。没接到回信，她还是等着……记不得在一本什么杂志上，她读到过他的文章，关于怎样当好律师。“我应该找他。”她很相信自己心灵的感应。

等着，向他述说一切？她不轻易“诉苦”。走在马路上，看到那些乞丐，坦露自己的痛苦，以求得一点点同情的施舍，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的心并不高傲，但在精神上，她决不做乞丐。……

思绪又关不住了。她合上了书。

屋檐下，有只鸟笼子。笼子里跳跃着一只金黄色的小鸟。她看到了，立刻扔下书，跑到屋檐下。笼子是谁的？她真想恳求主人，把小鸟放走吧！小鸟伸着脖子，烦躁不安地跳来跳去，一刻不停地用尖硬的嘴啄着笼格子，不停地试探着每个空隙，它想飞出去。蓝天多好啊，大地多好啊……

她曾象这笼子里的小鸟，被关过，在一间只有四平方米的小屋里，罪状是：反中央文革。只有四平米呀，跨过去四步，跨过来四步，再跨过去……满是污秽的铁窗外，总有一只苍蝇，用有毛的脚，粘着灰扑扑的玻璃，来来回回地爬，还发出“啾啾”的响声，似乎是故意的。讨厌的苍蝇，也变得神气了。因为它在玻璃窗外，因为它随时可以飞，自由自在。如果有一天，她也能飞出

铁窗，她一定奔上一条宽阔的、无止境的大路，不停地奔，直到累倒在地上……

整整一年，春夏秋冬。走出铁窗，面前真有一条平坦的大路。奔吧，跑吧。她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。

但现在……

天地又那么狭小了，一张窄窄的床，床与床之间，一条窄窄的过道。或者在这窄窄的过道上机械地踱步，象只被牵动的木偶；或者躺在窄窄的床上，象个冬眠的狗熊没有知觉地傻睡。但她明明醒着，还得一动不能动地装睡。药吐了……

没有比这种“治疗”更难以忍受的刑罚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数过了一百又数一百。病房安静得象墓穴。只有她的心，在不断地、重复地发出一种声音：

Le vierge, le vivace……

(纯洁、活泼的……)

Le vierge, le vivace……

但人的意志，毕竟是有限的。

她找主治医生谈。找护士长谈。找护士谈。

“我没有病。我相信你的医学是真正的科学。但你为什么不能科学地来检验一颗健康的心，一个清醒的头脑？”

主治医生只是沉默。

“请求你不要让我吃药，即使在这儿住上半年，一年，我还是我，和所有健康的人一样。”

护士长为难地摇摇头，“我的职责，只能是绝对服从医生的嘱咐。”

“护士，难道你不觉得，我和所有的病人都不一样吗？”她轻轻地走进护士值班室。

小护士用眼光暗示她：不要说下去了。晚上查夜，她感觉到

小护士穿着无声的软底鞋，走近她的床边，默默地站了很久……

她一动不动，牙咬得紧紧的。

“让我回去一次，拿点衣服。”有一天，她躺着不肯起来了。
送来的三顿饭，仍在床边的小柜上。

“不要这样。”小护士来劝。

她闭着眼。

“我们可以帮你反映，饭总得吃。”护士长也跑来了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……”来查病房的主治医生，拿着她的“病历”，在床边站了一会儿。

她轻轻地开口了，“医生，我的病很特殊、很严重吧？但是，它对你的医学研究，也许并没有价值。”

三天，她滴水不进，又拒绝输液。

第四天，小护士走进来推推她，又微微一笑。

她“噎”地坐了起来。

“让我们陪着你。”小护士又悄悄地说，“别怪主治医生，你来，市委组织部有信……”

她跳下床，跌跌撞撞地跑出医院的铁门，仿佛走出了深深的、没有出路的峡谷，又看到了绿茵茵的平原，银光闪闪的河流，炊烟袅袅的小屋……她不愿意再回头看那扇铁门，尽管那里有主治医生深邃的眼光，有护士长慈母般的手，还有小护士善良的微笑……

象一场恶梦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好象是八岁那年。

自从离开了那条小河——她曾寄养在河边的一座茅屋里。自从走进了父亲、母亲的家——一幢陌生的、象电影里只有资本家

才有得住的花园小洋房……

她在心里对自己说。又仿佛那位年轻的律师已坐在木板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。她有很多很多要说的。她要从头说起……

“明天都去。全家都去。”父亲难得有这样的兴致，他总是忙，很忙。因为弟弟吵了几次，要去山里玩，也因为第二天是父亲的生日。

我们坐着市委的小汽车，一路很高兴。但汽车进山后，没走出多远，有几个老乡拦下了我们：

“请帮帮忙，一个上山砍柴的小女孩，从山上滚下来，头磕破了，手摔断了，躺在那边沟里又哭又嚎。我们也是过路的。麻烦你们把她送到县医院……”

“不管。”妈妈一扭头。

“真讨厌。”弟弟叫起来。

我用眼光求爸爸。我在乡下时，跟着一群群的孩子，也上山砍过柴。砍柴很累。可有什么办法。他们卖掉一捆柴，多少能换点钱呀。

“这种人，我见多了，捎上他们，有得麻烦。”司机也嘟哝一句。

“爸爸，走吧，快走吧！”弟弟催促。

我忍不住了。“爸爸，你看，沟里一大滩血……”

爸爸为难地皱了皱眉，用征询的口气对妈妈说，“带上吧，否则……”

妈妈不乐意地哼了一声。

我连忙到车门口，让小女孩躺在我身上。她“妈呀妈”的哭叫着，瘦小的身子在我也很细弱的胳膊里，不停地抽动（我不过比她大四、五岁）。血淌在我脸上、手上，我感到一阵阵恶心，

心里又很难过。

“别哭了，讨厌死了。”弟弟又撇嘴，又瞪眼。

“你家在哪儿？”妈妈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张……桥……大队。”她哆嗦着说。

“不远，就在前面。”司机说。

车开过张桥大队，停下了。一群孩子好奇地涌过来，一看到我胳膊里的小女孩，都惊叫着跑了，象一群挨了弹弓的小麻雀。不一会儿，小道上奔来一个干瘦的妇女，神色很惶恐，她一抓住车门，就嚎啕大哭，“我说不让你去……”

“别哭了，先上车，快送医院。”

“回家去拿点钱，看病要钱。”

几个农民，在一边七嘴八舌。

“钱？哪来现钱？”那妇女手足无措，急得直冒汗。

“这样吧，你们先抬她下去，到大队卫生站包扎一下，把血止住，再商量送医院的事。”妈妈“好心好意”地说。

“别让我走，去医院……”小女孩苦苦央求着，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

“他们是救命恩人，说得对，先把血止住。”不知谁插了一句。

那妇女犹犹豫豫地抱下了小女孩。

我们的小车开了。我软软地埋在座椅里，好象自己也刚从山上摔下来。整整一天，我不想说话，不想吃东西。弟弟冲我发脾气，“同你这种乡下人一道出来玩，真没劲。”

“扫兴。”妈妈也不满。

但我还想着那个小女孩，总有点心神不定。

第二天一放学，我坐上长途车，去张桥大队，打听那个小女孩。路边，有个放羊的小男孩告诉我，“她死了！”

“没往县医院送？”

“送了。队里套牛车送的。没到医院就咽气了。医生说送晚了。”小男孩眼泪汪汪，“大队卫生站管啥用？！”

他好象在责备我。

我不知道怎么回家的，耳边不断萦绕着小女孩苦苦的央求声，“别让我走，去医院……”“别让我走……”本来，她不会死，不会死的……

到家很晚，天漆黑一团。但家里所有的灯都亮着，亮得象宫殿。我推开门才想到，今天是父亲的生日。家里客人很多，桌上、柜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盒，盒子外大多扎着红绸带。爸爸和几个伯伯，兴高采烈地围着几匹英俊、神气的瓷马，啧啧地赞赏着，只听他们争先恐后地说什么，“……是唐三彩马……真东西……外国人看到了，肯出大价钱……”爸爸很得意地晃着头，“我是喜好收藏，自个儿欣赏，不卖、不卖……”

我走进客厅，只觉得舌头是麻木的，说不出话。我没有称呼这些陌生的客人，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墙角里的一张椅子上。妈妈冷冷地瞥我一眼，对几个客人解释道，“这孩子生来怪脾气，一点不懂事。明知道她爸过生日，不知跑哪儿去了……”

“怪脾气！”“不懂事！”我就这样开始留在了别人的印象中。

但那时，我不以为然。不觉得这种评价，对我有多么重要。

写作文，《一件难忘的事》。我把刻在我心里的这一刀，如实地写了出来。不知道是事情的本身震动了老师，还是我充满感情的描写感动了老师。老师给了一个五分加一个五角星，还写了一句评语：“你是个真实、善良的好学生。”

“真实的、善良的”。我又有了另一种评价。

我到底是什么样的？那时，我没有多想。我并不看重别人眼

